

地域文化与陈子昂燕赵纪行诗的双向构建

冯淑然, 李嘉航

(内蒙古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内蒙古 通辽 028000)

[摘要] 陈子昂于通天元年(696年)随武攸宜北上燕赵讨伐契丹的赴边经历对陈子昂后期的诗歌创作和《修竹篇序》中“兴寄”“风骨”等理论的提出影响极大。荆轲、田光等人奠定的任侠重义的文化传统塑造着陈子昂以死报恩的侠义人格;在汉魏之交形成的慷慨悲歌的文化基调推动了陈子昂悲慨浓郁的诗歌创作;受汉唐经学影响的质朴厚重的文化风貌感染了陈子昂敦实厚重的文化态度,同时陈子昂在对燕赵文化的反复题写的过程中也丰富着该地的文化内涵,实现着燕赵文化的唐代构建。

[关键词] 燕赵文化;陈子昂;文学地理学;地域文化

doi:10.3969/j.issn.1673-9477.2025.01.012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477(2025)01-0087-07

文学地理学认为处于具体环境中的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势必会受到其所处地域自然或人文环境的影响,而且受后者的影响更为显著。曾大兴对此提出了“人文气候”的概念,认为一地的人文气候对该地内部的文学产生作用的同时,也辐射着其他文化背景文人的文学创作,用以阐明地域文化对作家创作的深刻影响,这与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到的“江山之助论”意涵相似。人文地理学者以相邻地域所展示出的共同文化倾向为基准,在中华大地上分出了11个主要的形式文学区^①,尽管各位学者对燕赵文学区的边界框定略有出入,但是其核心文化区是极为统一的,即春秋战国时燕国、中山国与赵国所辐射的相关地带,也便是今天的河北、北京及天津地区^②。

通天元年(696年)九月随武攸宜北上燕赵讨伐契丹的赴边经历使陈子昂对政治斗争、人生追求等现实问题和文学创作的诗心文脉等文学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同时,陈子昂的燕赵纪行之作中对黄金台、幽州台、蓟丘等燕赵地区的名人古迹以及与燕昭王、荆轲、太子丹有关的历史故事多有题咏。陈子昂在燕赵从军时期记录描绘燕赵地区风土人情与历史景观的纪行诗作共7题13首,作文20篇。作为陈子昂至交好友的卢藏用和赵元亮分别为幽州范阳人和沧州河间人,三人之间多有诗文唱和,如《赠赵六贞固二首》《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等,卢藏用在陈子昂死后为其作《陈氏别传》,高度评价其人

格诗论,陈子昂在燕赵之行多年后还谈到“游楚复游燕”,可见燕赵文化与陈子昂的紧密关系。燕赵文化为了与其原有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态度相呼应,在其固有的精神文化中加入新的元素。前贤对陈子昂诗作多有关,个案如《登幽州台歌》的系年考察、《修竹篇序》的文学史地位探究等,专题如燕赵文化对唐文学的影响^③,本文在考察燕赵文化区核心内涵的基础上,以陈子昂为基点做个案研究,重新审视其人、其诗、其论与燕赵之地的侠文化传统、慷慨悲歌的情感氛围以及敦厚务实的文化环境的双向建构关系。

一、任侠使气的精神互动

班固在《汉书·季布栾布田叔传》里谈到任侠:

①曾大兴认为,在中国境内,由北而南存在着东北文学区、秦陇文学区、三晋文学区、中原文学区、燕赵文学区、齐鲁文学区、巴蜀文学区、荆楚文学区、吴越文学区、闽台文学区和岭南文学区等11个主要的形式文学区。

②关于北京、天津是否应该纳入燕赵文学区的问题,张鹏的《论建安文学与燕赵文化的关系》与曾大兴的《文学地理学概论》认为燕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而文学地理学所讲的燕赵文学,即今天的河北、北京、天津等一省两市的文学。

③如韩成武、赵林涛、李新的《盛唐河北诗人群与“燕赵文化精神”》(载《河北学刊》2006年第4期),蔡欣兰的《豪侠慷慨 质朴尚实——论燕赵地域文化对唐代诗风的影响》(载《大众文艺》2016年第11期),李荣平的《唐代幽州诗研究》(内蒙古大学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

[投稿日期] 2024-10-12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编号:19ZDA281);内蒙古自治区草原文学理论基地项目(编号:2019ZJD042)

[作者简介] 冯淑然(1969—),女,河北曲阳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唐宋文学研究。

“为任侠有名。”^{[1]1975} 颜师古注曰:“任,谓任使其气力,侠之言挟也,以权力侠辅人。”^{[1]1975} 其特点往往是“凭借权威、勇力或财力等手段扶救贫弱,襄助他人。”^{[2]6} 侠文化自《韩非子·五蠹》发端,“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表明侠客勇武的特点,汉代司马迁的《史记》单独开辟了《游侠列传》,对“侠”作出了基本的定义,即“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3]722},对其进行了道义上的总结。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弟子和文人墨客开始自发或被动地习武、崇侠、从军,走入了武侠的行列”^{[2]26}。康震认为:“任侠在唐代社会开始由单一的个人英雄主义向着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理想主义相结合的更高的境界升华。”^[4]就普遍意义上来讲,侠文化以尚武重气、尚诺重义为主要特点。

燕赵地区的侠文化除普遍内涵而言,更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点。其原始特点和基本面貌在战国时期形成,燕赵二国的侠文化传统略有区别。赵国土地资源优渥、商业环境繁荣,国力强盛、人民生活富足,此地的侠客轻财豪爽,开创了侠文化中豪侠的一支。而燕国则不然,燕国位于赵国以北,气候寒冷、苦寒卑弱,因此该地侠文化以刚烈悲壮为主要特色。又加之燕国后期自身卑微柔弱,周边虎狼环伺,导致燕地的侠客多在复仇过程中壮烈牺牲,这便奠定了燕地侠文化厚重坚韧、刚猛无畏、甘愿赴死、纵死不辞的基本特征。张京华认为:“社会繁荣所形成的是志高而扬的大国之风,燕地则是一剑以当百万之师的侠士奇锋。燕地苦寒卑弱、因之它的文化也就自伤自怨,刚烈悲壮。”^[5]荆轲为报燕太子丹的知遇之恩刺秦而亡,田光为守护侠士重义守信的道德人格自刎而死,樊于期重信守诺献出首级,这些侠客无不慷慨赴死。班固在《汉书》中对燕赵二地的记载也颇有区别,他对赵地的描述是“赵、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乱余民,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椎剽掘冢,作奸巧,多弄物,为倡优,女子弹弦,跕躑,游媚富贵,遍诸侯之后宫”^{[1]1655}。从中可见西汉以前赵地的繁荣景象,百姓相与交欢,悠游无度。而对燕地的描述则是“蓟南通齐赵,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初,太子丹宾养勇士,不爱后宫美女,民化以为俗,至今犹然:宾客相过,以妇侍宿;嫁取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后稍颇止,然终未改其俗,愚悍少虑,轻薄无威,亦有所长,敢于急人”^{[1]1657}。班固所载汉代燕地之人敢于急人之难,愚悍少虑。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理志中并无关于燕赵之地的民风民俗

的介绍,但是从曹植的《白马篇》中我们可以窥见幽并游侠儿的人格特点,“白马饰金羁”展现了幽并游侠的豪侠气质,“捐躯赴国难,誓死忽如归”又体现了其忠义报国、视死如归的侠客气质。由此观之,在魏晋时期,燕赵之侠的文化气质由不同侧重开始走向统一。《隋书·地理志》以“俗重气侠,好结朋党,其相赴死生,亦出于仁义”^{[6]859}论燕赵之地的侠风。由上可见,燕赵二地的侠文化除了传统意义上的重信报恩、武勇卫国和功成身退等表现以外,还往往与死亡相伴,故而更为厚重,更为深刻。

(一)任侠精神的文学强化

陈子昂所作燕赵纪行诗中绝大多数诗歌表现着其对燕赵侠文化原有内涵的强化。他在燕地所作的与侠文化有关的诗歌占这一时期所作诗歌的一半以上,在《登蓟城西北楼送崔著作融入都》的序言中谈到“抚剑何道?长谣增叹。以身许国,我则当仁,论道匡君,子思报主”^{[7]193},其中“抚剑”“长谣”颇有战国遗风。他在远赴幽燕之前对武则天言道:“臣请束身塞上,奋命贼庭,效一卒之力,答再生之施,庶陛下威命,绥服荒夷,愚臣罪戾,时补万一。”^①^{[7]57}为报皇帝恩遇之情,他请求远赴边疆,以身许国,渴求功业抱负,他梦想着“当取金人祭,还歌凯入都”^{[8]197-198}。然而,当他被武攸宜闲置之后,登上蓟州城楼,抚今追昔,想起荆轲与太子丹之故事,便又悲痛了。

陈子昂在《燕太子》与《田光先生》中对太子丹铤而走险,以刺杀的方式保全燕国的复仇行为颇为赞叹,同时,对成全此桩大事的荆轲与田光也给予了高度赞扬,尤以田光为重。诗云:“一闻田光义,匕首赠千金”^{[8]205},“自古皆有死,徇义良独稀”^{[8]206}。太子丹在逃回燕国后,广招侠士,伺机报仇,得知田光可行,便登门造访,而田光以“臣精已消亡……不敢图国事”为由,向他推荐荆轲,太子丹临行之时告诫田光:“先生所言者,国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也。”田光见荆轲,在其允诺后,言:“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国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为行而使人疑之,非节侠也。”^{[3]5492}于是伏剑自刎而死。如此,陈子昂在同样不被人信赖的田光身上找到了

①此文是陈子昂向武则天谢恩之表,文中提到“不图识凶人,坐缘逆党”“身首获全,已是非分,官服具在,臣何敢安?……膺颜恩造,复臣旧职”,由此可知当为复官右拾遗时即证圣元年(695年)所作。次年,武则天便令陈子昂以本官参谋,跟随武攸宜讨伐契丹。

倾吐郁结之气的连接点,但发牢骚的同时,他也对这种敢于以死守护侠客信念的守义行为深表赞叹,这足以见得燕赵侠士情结对陈子昂内心信念的影响。此外,《新唐书》记载:“(陈子昂)少而任侠,乐善好施,劫富济贫。”少时的陈子昂贯彻的是豪侠一路,以“义”为主,尽己所能帮助穷苦之辈,此所谓仗义行侠。卢藏用《陈氏别传》记载:“大王诚能听愚计,乞分麾下万人,以为前驱,则王之功可立也。”^{[8]259} 赵儋《旌德碑》中也有相似的叙述:“公乃进谏,感激忠义,料敌决策,请分麾下万人,以为前驱,奋不顾身,上报于建安。”^{[8]263} 壮年的陈子昂在其思想体系中融合了燕赵之侠以死报国的厚重与担当,具有一种老成气概。

(二)任侠使气的内涵拓展

陈子昂燕赵纪行诗还为深厚的燕赵侠文化带来了新的自由浪漫元素。陈子昂所生活的蜀地也是侠文化的重要发源地,然巴蜀地区山脉环绕,四塞封闭,因而儒家文化影响较小,禁锢较松,百姓的叛逆意识较强。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总结说:“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9] 该地的侠文化以反抗为主,又因道教文化发达,所以为侠文化带来了自由潇洒的气度。陈子昂在游历燕赵之时,自然感觉到两种地域文化的差别,蜀地之侠在轻狂,在自由潇洒,而燕赵之侠在厚重,在担负坚韧。尽管陈子昂在来到燕赵之前还去过西北地区,如甘肃张掖等地,但是那里的侠文化传统不太突出,况且,陈子昂在西北地区的经历远没有燕赵之地痛苦深刻,因而燕赵地区的任侠精神与陈子昂呼应最强烈,共鸣最深厚。陈子昂为燕赵之地的侠文化传统带来了自由潇洒的审美特点,冲淡了此地厚重深刻的任侠精神。陈子昂在《感遇·其三十四》中描述的游侠便带有强烈的自由气度,丰富了中国文学史中的侠客形象。主人公“自言幽燕客,结发事远游”,然而他似乎并不像以往侠客一样慷慨坦荡,在“赤丸杀公吏,白刃报私仇”后,“避仇至海上,被役此边州”。^{[8]57} 从中可见,当时的燕赵侠风何等盛行!但我们也注意到,在弥漫的侠风之下,陈子昂将燕赵百姓厚重而深刻的以仗义复仇为行为基点的侠客行径与其本籍文化中任侠精神的浪漫潇洒特质高度结合,拓展了燕赵之地侠文化的内在精神与外部表征。

陈子昂之所以能在四十岁(698年)之时高呼出“文章道弊,五百年矣”^{[8]217},之所以能主动承担起诗歌革新的历史使命,与其对燕赵之地侠文化传统的接受是密不可分的。文学史通常将初唐诗歌的最后

一声怒吼归功于陈子昂,从他之后,“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盛唐气象便出现了。罗宗强先生一方面认为不能割裂地将文学发展的功劳归结于一人一事,同时他也承认了陈子昂作为初盛唐诗运转关的关键作用,因为陈子昂担负起了唐太宗、魏征以及初唐四杰并未完成的任务,那便是回答了摆脱齐梁诗风后的诗歌该往何处去的问题,他所提出的“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诗美理想是具体的,有理论高度的,是适应诗歌发展潮流的。陈子昂在仗义行侠这一行为基点上找到了本籍与客籍文化的结合点,他的燕赵纪行诗中一方面强化了燕赵之地以复仇为出发点的任侠特色,另一方面也加入了由蜀地文化带来的潇洒自由的气度,丰富了燕赵之地侠文化的表征向度。

二、慷慨悲歌的情感渗透

韩愈称“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10]。诚然,燕赵文化最直观、最感性的表现便是慷慨悲歌这一文化特质,慷慨者,燕赵文化之胸怀气度也;悲歌者,燕赵文化之情感风貌也。

如上所述,战国时燕国地卑民困、气骨偏狭,较为贫瘠的生活状态奠定了朴实激烈的文化风貌,由侠文化引发的以重恩报义和以死抗争为代表的刚烈之气的地域风骨也在战国时期逐渐发展。汉代的燕赵大地激荡着战国余风,燕国文化与赵国文化在大一统的历史背景下,逐渐走向浑融,呈现出相似的文化区块特点,此时,以朴实刚烈、积极进取、勇于抗争等文化气质为表征的慷慨悲歌的地域传统逐渐完善。东汉三国时期,战争频仍,朝不保夕,社会中弥漫着沉痛的感伤氛围,这与燕赵的地域文化特质相契合,慷慨悲歌的地域文化于此时形成,并获得极大发展。以曹氏父子为代表的邺下文人集团的成立与文学创作实践标志着慷慨悲歌的燕赵文化传统与建安风骨的文学创作理念相融通,并逐渐作用于文学作品之中。曹操在燕赵地区生活近16年,邺城也一度成为曹魏集团的政治文化中心,曹操对燕赵文化的接受是极为显著的,纵览其诗其文,无一不带有慷慨悲歌的文化气息,如作于碣石山(今秦皇岛境内)的《观沧海》气象壮大,昂扬慷慨,作于赤壁之战前夕的《短歌行》立志高远,充盈着一股伤心悲慨之气,这纵然与时代气质紧密相关,但与燕赵之地的地域文化更加密切。南北朝时期,燕赵之地被鲜卑、羯等少数民族政权轮流统治,胡风在燕赵大地上盛行,游牧文化与农耕文明相互交融碰撞,为业已形成的慷慨

悲歌注入了武威健壮、骨力浑厚的文化内涵。隋代与初唐时期以唐太宗、魏征等人为代表的文学革新派主张向建安风骨看齐,合南北文化两长,提出了“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义贞刚,重乎气质……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6]1730}的口号。但这种革新文学的考量并不是基于文学本身的生存现状和发展方向出发的,而是带有相当程度的笼络江南文人的政治意图,以江南文人的视野来看,在经历长达369年的南北对峙与文化割据之后,北方文化无疑作为一种“异质文化”而存在,此时提出合南北文学两长的革新主张明显带有一种提升北方文学话语地位的政治意蕴。即便如此,也证明最高皇权、官僚阶级和某些底层文人逐渐意识到刚健昂扬、雄浑壮大的北方文化在全国文化系统中的重要地位,其中,初唐四杰对慷慨悲歌、尚武重气的燕赵文化内涵具有发扬之功。此外,慷慨悲歌的地域文化传统也感召和驱动着陈子昂的人、诗、论,同时,陈子昂在诗歌创作中也凝定丰富着慷慨悲歌的地域文化传统。

(一) 慷慨悲歌传统的感召与驱动

燕赵之地的慷慨悲歌精神激励着陈子昂的人生追求与文学创作。卢藏用评价陈子昂“感激忠义”“貌寝寡援,然言王霸大略,君臣之际,甚慷慨焉”^{[8]259},杜甫评其“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作为谏官的他本身带有的忠义气质与慷慨激烈的地域文化有着极强的相似性,并且他志存高远却沉沦下僚,勤劳国事但为人质疑的人生经历又与苦痛悲歌的地域传统默然契合。因而,燕赵文化为陈子昂提供了情绪的泄洪口。在远赴燕赵之前,陈子昂科举落榜之后,依然尊称皇帝为明主;身为右拾遗,恪尽职守,尽管对武则天的弊政积极进言,但是对核心权力依然保持敬畏,恪守着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言志观,而在陈子昂被武攸宜贬为军曹掌书记后,情感发泄便一发不可收拾了。

因登蓟北楼,感昔乐生、燕昭之事,赋诗数首,乃泫然流涕而歌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8]208}

陈子昂登上幽州城楼,极目远眺,在一望无际的偌大空间中只有自己孤独一人,他又想从历史中寻求共鸣,但是回望历史却感觉自己是历史长河中最为孤独悲伤之人,在创作时间略早于此诗的《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中,他写轩辕、燕昭王、燕太子丹,在感慕其圣明仁德的同时,都表达了对贤明君主的渴求和悲痛的身世之感,他写田光、郭隗,是为了

表达对“隗君亦何幸,遂起黄金台”^{[8]207}的羡慕和向往。这些明主贤臣都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顾影自怜,陈子昂难免伤悲,他还想到后人可能不会比自己的境况更糟,于是在空间和时间中都找不到宽慰的陈子昂蓦然流泪。思想的跳跃性、思维的逻辑性、情感的激烈性都包蕴在此诗之中,就陈子昂的创作实践来看慷慨悲歌的文化传统与韩愈所提出的“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的文学创作论具有极高的相似性,陈子昂受自身经历的影响,极为恰切地接受并继承了燕赵之地以慷慨气度发悲恻之歌的文化特点。

(二) 慷慨悲歌传统的凝定与丰富

陈子昂在燕赵纪行诗中还通过真切描述历史,激烈抒发议论的方式,丰富了燕赵文学中慷慨悲歌的创作表征。陈子昂对燕赵文化的理解和接受有其文化背景,就其本籍文化——巴蜀文化来讲,同燕赵文化一样,也是一种开放外露、激烈扬厉的地域文化,两种文化的相似性为陈子昂接受燕赵文化提供了一个“缓冲地带”,接受过程中几乎不会产生某种“异质文化”的审美错觉。陈子昂作于燕赵之地的诗歌和作于西北甘肃的诗歌迥异,作于西北地区的诗歌中经常出现甘肃特有的风物景观,如“边地无芳树,莺声忽听新”^{[8]129}、“雁山横代北,狐塞接云中”^{[8]134}等。或许是因为第一次接触边地的风物景观,诗人对一切与自己的生活习惯相异的自然风物和文化景观都秉持着一种距离感与好奇心,因而此时所作诗歌多呈现丰富的边地意象。但是在燕赵之地所作诗歌的重心却在文化的呼应与历史的追思上,他跳过了对山川塞漠的描摹,对文化基质的感慨,而直接进入对深层文化内涵的反思上。陈子昂在《燕昭王》^{[8]203}中以深切的笔调抒发了对燕昭王的怀念。

南登碣石阪,遥望黄金台。

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

霸图怅已矣,驱马复归来。

诗歌三联按照“行止+怀古+面对现实”的顺序展开,陈子昂真切地描述了燕昭王铸黄金台,招贤纳士,渴求天下士子的历史故事,虽然并未使用想象之词描绘当时境貌,仅使用“黄金台”“燕昭王”二词便将该事典概括完全。黄金台故址学术界颇有争议,现已不可考。诗人无处展才,通过对燕昭王的深切怀念来表现其深重的渴求贤主的愿望。“其事虽不立,千载为伤心”(《燕太子》)^{[8]201}“伏剑诚已矣,感我涕沾衣”(《田光先生》)^{[8]205}“兴亡已千载,今也则无推”(《邹衍》)^{[8]206}“逢时独为贵,历代非无才”

(《郭隗》)^{[8]207} 等诗作皆表现出陈子昂以描述历史,抒发感慨的方式书写悲歌。这些诗中一方面满含着对生不逢时的身世之感的苦闷与牢骚,另一方面也不乏对嫉贤妒能的小人行径的披露与讽刺。陈子昂通过反复述说燕赵之地的历史人文,一遍遍地用文学形式塑造着如燕昭王、太子丹、邹衍等燕赵历史名人和黄金台等文化故地,同时,诗人在歌咏之时,采用慷慨激烈、深沉厚重的笔调抒发自己对明主已逝的怅惘,怀才不遇的感伤,贤臣得幸的羡慕,反哺了以慷慨悲歌为主要特色的燕赵文化。

三、敦厚务实的风格感染

韩成武先生认为燕赵文化区的文化特质主要表现为“任侠使气、慷慨悲歌、崇儒尚雅、敦厚务实,前二者是传统,后二者是增生”^[11],他关注到了燕赵文化较之于其他文化区块的敦厚务实的文化特质,笔者认为,后二者中,敦厚务实的文化传统也可看作是崇儒尚雅文化态度的增生。陈子昂在燕地所作之诗情感深重,其诗歌理论彰显的是对务实传统的发扬,符合文学发展的创作实际,同时,陈子昂的创作实践也丰富着敦厚务实的燕赵文化传统。

敦厚务实的文化风格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已经内化为燕赵精神的文化基因,春秋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因宽袍大袖的传统服饰不适应战场需要,于是改造传统,使用胡服和单骑战斗,此时开始,务实的文化传统便自上而下潜移默化地推广开去。燕赵文化敦厚务实的特质与儒学传播发展的文化境况和北方民族统治的社会历史条件之关系最为密切。汉儒董仲舒(今河北省景县人)主张“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自此开始,以汉代经学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便逐渐改造着燕赵士人的文化传统,经学家所提倡的严谨务实、质木无文的学术态度成为了燕赵地区统一的社会气质。如上所述,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在入主中原的过程中,燕赵之地作为其首要征服的地带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这与燕赵文化的质朴务实相融通,此时的经学亦十分发达,北学的重心即是河北,北方之学实际上就是河北之学。^{[12]228} 隋唐时期,儒学和经学的发展伴随着唐太宗令冀州人孔颖达编修《五经定本》与《五经正义》这一历史事件达到了高峰,据《新唐书·儒学》篇载,河北籍的儒学大师有孔颖达、马嘉运、彭景直、卢履冰、侯行果等十八人,考其生平,主要分布于初盛唐,这些人开馆授徒,教授于乡里,门客弟子多达千人。具有潜行性特点的经学文化在燕赵地区产生了强烈的回响,不断塑造着燕赵文化敦厚务实的风格特点。

(一)对敦厚务实精神的发扬

陈子昂的诗歌创作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创作分期,在其第一次赴边之前即垂拱二年(686年)以前,受巴蜀文学风格的影响较为密切,呈现出以积极乐观、建功立业为主的情感状态,时而表达道教玄学思想,多想象浪漫之作。在远赴甘肃时期,写下了一批西北纪行诗作,在表现居延海、张掖等地域的风光民俗之时,或洋溢着充盈的理想和勃发的激情。如“晚风吹画角,春色耀飞旌”(《和陆明府赠将军重出塞》)^{[8]136} 和“雁山横代北,狐塞接云中”(《送魏大从军》)^{[8]134}。或因政治艰险而生发归隐之思,如“无为空自老,含叹负生平”(《题居延古城赠乔十二知之》)^{[8]127} 前者呈现了西北地区的独特风貌,而后者表明陈子昂尚未摆脱前期的归隐思想,其所作燕赵诗歌一改原有的创作面貌。较之于前期的浪漫色彩,此时的诗歌风格已是敦实稳健了。燕赵文化为陈子昂提供的是情感发泄的基石,而并未限制其情感发泄,故其诗中时常表露出激烈愤慨的情绪。具体表征为借用怀古的方式,抚今追昔,内容含量与情感表达更为厚重,其倾吐不平之气的情感基石更加深沉,如“应龙已不见,牧马空黄埃”“自古皆有死,徇义良独稀”等诗,均传达出一种苍茫雄浑之气。在此期间,陈子昂还对自身的过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感叹,在《同宋参军之问梦赵六赠卢陈二子之作》中谈到“畴昔疑缘业,儒道两相妨”“奈何苍生望,卒为黄绶欺”“铭鼎功未立,山林事亦微”^{[8]211},陈子昂从自身的思想体系、生平经历和外部的政治环境等角度自我反思,实可谓痛心疾首!此外,政治环境的艰险,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使得陈子昂将全部精力放在了“孤负平生愿,感涕下沾襟”的情感倾泻上,较少产生归隐东山的愿望了。

潘链钰认为陈子昂本身的儒学修为是其提出该理论的文化前提,“历史之所以赋予他如此崇高的使命,还是因为他骨子里昂扬不灭的儒家‘经营’致用之旨”^[13]。诚然如此,然燕赵经学传统对其影响亦不可忽视。陈子昂借用《诗经》中的“比兴”“寄托”手法作诗意在表明诗歌创作需要真实的情感触发,主张务实,而非雕词镂句,空疏乏陈,无病呻吟。“‘骨’指诗歌应该有一种劲健刚直的思想力量,故言‘端’,‘端’者,端直……气,指诗歌应有一种浓烈昂扬的感情力量,故言‘翔’,‘翔’者,高扬俊爽。”^{[14]47} 陈子昂认为文学创作应向建安风骨学习,立意须端正,抒情须充盈。除《修竹篇序》外,陈子昂还在其他诗序中提到诗文与情感的关系,如“请各陈

志,以序离襟”(《金门钱东平序》)^{[7]155}、“诗言志也,可得闻乎”(《薛大夫山亭宴序》)^{[7]156}、“盍各言志,以叙离歌”(《钱陈少府从军序》)^{[7]158}、“赋诗以赠”(《送吉州杜司户审言序》)^{[7]158}、“我之怀矣,实在于斯”(《冬夜宴临邛李录事宅序》)^{[7]160}、“斯文未丧,题之此山”(《晖上人房钱齐少府使入京府序》)^{[7]161}、“挥手何赠,诗以永言”(《偶遇巴西姜主簿序》)^{[7]163}、“金曰赋诗,绝句以赠”(《送曲郎将使默啜序》)^{[7]163},可见陈子昂一方面主张文学作品需要承载浑厚骨力,另一方面认为情感表达需要避免匮乏。

(二)对明理尚经传统的补充

敦厚务实的燕赵文化的另一个侧重点便是明理尚经,由之而带来的是文化上的质木无文,陈子昂认为文化在务实的基础上还应该具有形式美,这一主张丰富着燕赵文化内涵。陈子昂《修竹篇序》提出“兴寄”“风骨”“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诗歌创作论,这一方面与燕赵之地务实传统相融通,另一方面也可看出陈子昂发现了这片地区在经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所暴露出来的“质木无文”的文学弊病。作为文学革新家的陈子昂既没有偏向于颇重词采的南朝诗风,也没有偏向于重视实际的燕赵传统,而是响应了初唐文坛的号召,顺应文学发展的大势,提倡南北文化的融合。陈子昂也注意到了燕赵文化存在的重经尚理思想。质木无文的文学问题,在浑厚骨力之外还提出了“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创作要求,陈子昂认为,诗歌之所以成为诗歌,词采音节是诗人创作的必要条件。要求文字音律跌宕与诗人感情的起伏相一致,还需要用健康干练的文辞来传递思想,此外,诗歌音律需要尽可能符合“金声玉振”的雅乐思想。如《登蓟丘楼送贾兵曹入都》^{[8]210}。

东山宿昔意,北征非我心。
孤负平生愿,感涕下沾襟。
暮登蓟楼上,永望燕山岑。
辽海方漫漫,胡沙飞且深。
峨眉杳如梦,仙子曷由寻。
击剑起叹息,白日忽西沈。
闻君洛阳使,因子寄南音。

陈子昂之燕赵纪行诗多以古体写古事,不论是《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还是《登幽州台歌》,其音节音律与沈宋所创律绝迥异,罗宗强先生认为:“音情顿挫,盖指诗之声律节奏而言。……可以看出他是主张自然声律的。他要求诗应该做到音节抑扬顿挫。而且光是音节抑扬顿挫还不够,感情的表达

方式也应该做到抑扬顿挫,犹今之言诗之感情旋律波澜起伏。……进而又要求辞采光彩辉映,明朗皎洁。”^{[14]47}高棅在《唐诗品汇》中点评道:“能掩王、卢之靡韵,抑沈、宋之新声,继往开来,中流砥柱,上遏贞观之微波,下决开元之正派。”^[15]从中可见陈子昂融合以巴蜀文化为代表的南方文化和以燕赵文化为代表的北方文化的努力,实现了燕赵文化的唐代发展。

在探讨陈子昂如何成为初唐向盛唐诗运转关的关键人物之时,地域文化尤其是燕赵文化对其影响不容忽视,正如南北朝时期的庾信一样,除本籍文化即南方文化对其影响以外,客籍文化即北方文化对其诗歌创作乃至文学地位建立的意义同样重大。燕地“人性多敦厚,务在农桑,好尚儒学而伤于迟重”^{[6]853}。任侠使气的文化传统与陈子昂的价值体系相契合,慷慨悲歌的文化风貌与陈子昂的人生经历相呼应,敦厚务实的文化生态与陈子昂的文化态度相承接。燕赵文化一方面奠定了陈子昂叛逆革新的性格气质,另一方面,建构了陈子昂以死报恩,崇恩重义的文化人格,反映在诗歌创作中,便是弥漫于抚今追昔的历史沉思之中的浓郁悲情和慷慨气度。燕赵文化的唐代构建受陈子昂作用而丰厚充盈,逐渐形成稳定而丰富的燕赵文化传统。回望历史,重新审视以任侠使气、慷慨悲歌和敦厚务实为代表的燕赵文化传统对激发当今燕赵人民的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更有助于促进燕赵文化的当代建构。

参考文献

-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2]白璐.汉末魏晋时期侠形象研究[D].郑州:郑州大学,2019.
- [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0.
- [4]康震.长安侠文化传统与唐诗的任侠主题——“长安文化与唐代诗歌研究”之一[J].人文杂志,2004(5):135-139.
- [5]张京华.燕赵文化[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257.
- [6]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 [7]陈子昂.陈子昂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8]陈子昂.陈子昂诗注[M].彭庆生,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 [9]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503.
- [10]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M].马其昶,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274.
- [11]韩成武,赵林涛,韩梦泽.燕赵文化精神与唐代燕赵诗人、唐诗风骨[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6):96-103.
- [12]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

- 版社,1992:228.
- [13] 潘链钰. 破立视阈下的初唐诗学建构研究——以“四杰”和陈子昂为中心[J].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122-128.
- [14] 罗宗强. 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M]. 北京:中华书局,2003.
- [15] 高棅. 唐诗品汇[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47.
- [责任编辑 李 新]

Two-Way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Culture and Chen Ziang's Travelogue Poems About Yan-Zhao Region

FENG Shuran, LI Jiaha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Inner Mongolia Minzu University, Tongliao, Inner Mongolia 028000, China)

Abstract: Chen Ziang's experience of travelling with Wu Youyi to the northern border to fight against the Khitan in the first year of Tongtian (696 A. D.)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his later poetic creation and the formulation of theories such as "Xingji" and "Fenggu" in his *Preface to Xiuzhu Chapter*. Besides, the cultural tradition of chivalry and loyalty; established by figures like Jing Ke and Tian Guang; shaped Chen Ziang's chivalrous personality; which was characterized by a readiness to die in gratitude. Additionally, the generous and tragic sentiment formed at the turn of the Han and Wei dynasties promoted Chen Ziang's creation of poignant and rich poetry. Still, the simple and profound cultural style influenced by the Confucian Classics from the Han to the Tang dynasties inspired Chen Ziang's sincere and profound cultural attitude. Moreover, Chen Ziang enriched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Yan-Zhao region through repeatedly writing about this regional culture; thus achieving the construction of Yan-Zhao culture in the Tang Dynasty.

Key Words: Yan-Zhao culture; Chen ziang; literary geography; regional culture